

现代大学与新文学关系个案研究的一个侧面

——论早期复旦国文教育（1917—1924）与浅草社

[中] 杨蓉蓉*

目 录

- 一、早期复旦国文教育与五四新文学
- 二、复旦校园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以浅草社为例
- 三、陈翔鹤与其未入集的短篇小说《青春》
- 四、结论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已渐由研究初期的宏观理论建构和两者关系论证，转向以“知识考古”的态度和方法，对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相关的历史现象进行追根溯源的“还原”。这些以往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和遮蔽的历史现象之所以在今天能凸显出来，首应归功于现代大学与新文学关系探讨过程中所带来的研究视域的转变。

中国新文学与现代大学关系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新文学课程的设置，具体表现为新文学走进大学讲堂，成为大学国文系课程表中的一门课程，作为教学内容以知识的形式被传播，作为研究对象被研究。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提示我们，新文学登上大学讲堂，进入学科课程设置，就意味着它从此具有了现代大学体制所赋予的知识控制权，具有了课程设置背后所隐藏的权威的“话语霸权”；同时，作为课程内容之一，新文学能够以知识的形式传播出去，并且还取得了大学所赋予的“学术”地位，这也就意味着新文学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也被传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chenrd@pku.edu.cn

播出去，为社会所接受。课程知识实际上成为一种社会建构，通过课程资源的获得，就建立起一种权力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因此，课程设置这对新文学发展本身来说，是富含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对此现代文学研究界多已注意到¹⁾，但却还没有完整地提出来，也还没有被系统地考察过。因此，新文学走进大学讲堂，即新文学课程设置成为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的一条关键线索。

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即便新文学还没有登上大学讲堂，它也早已活跃于大学校园之中，此现象并不以大学是否设置新文学课程为转移。同时，校园新文学创作等也是新文学与现代大学关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当围绕新文学课程设置进行论述之时，还以大学环境内的文学活动为线索，在研究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过程中，应尽力包含对这两条线索的历史描绘与勾勒。

因此，在这两条线索所建构的视域下，本文试图以复旦大学为个案，通过对其内部学国文教育，学生组成的新文学文学社团浅草社、以及浅草社重要代表作家陈翔鹤和他的佚文《青春》的考察，展现刚刚兴起的新文学在早期复旦校园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并以此管窥新文学与现代大学教育、作家个体成长与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之间的关系。

在观察新文学与复旦大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过程中，1917至1924是别有韵味的几年。1917年，复旦由公学升格为大学，开始逐步完善其现代大学制度，但1917年至1924年间，复旦的国文部教育却沿袭着传统国学的教育与研究方式，文史哲地不分，治学与修身并重，直至1924年建立国文系，并设置新文学课程。在这期间，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诞生于1917年并迅速走向繁荣的新文学，

1) 如陈平原在《新文学与新教育》中曾说：“从一代人‘文学常识’的改变，到‘文学革命’的诞生，其间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曲折与艰难；但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我以为是后人眼中平淡无奇的课程设计与教材撰写。”见：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实际上，课程研究是教育研究领域，一个特别受到重视的领域。近年来，我国的课程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注意了对怎么的课程是好课程，怎样设计、编制好课程，怎样制定和编写课程标准、课程大纲、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又注意到了从更宏观的背景上，展开了对课程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研究，特别是课程中知识、权力、控制等关系的研究。

被隔绝在复旦大学课堂内的知识传播过程之外，但却在学生自发的民间校园文学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与实践。因此，我们可以回想这样一个历史情境：此时此刻，新文学将入而未入大学现代学科体系，尚不具备现代学科权力来确立其合法地位，更无法在学科体制下合法地进行知识生产与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时新文学——仅仅为校园文学之一种，如何与大学文学教育和大学校园文学进行沟通、渗透甚或融合呢？当时的学生作家们在现代教育背景下的成长昭示着什么，他们在此情境下的个体生存体验又是怎样的呢？他们的个性发展与教育体制之间的张力又如何呢？校园文学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又扮演着怎样的复杂角色呢？

一、早期复旦国文教育与五四新文学

先从前文提到的新文学课程设置的线索来看。

复旦大学成立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1917年新文学诞生之时，复旦公学也创办了大学本科，正式改校名为私立复旦大学，并仿照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代大学制度，逐步设立了院系，完善了教学与管理。到1929年，复旦发展成为一所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学，拥有文、理、法、商四个学院，十五个系。复旦校内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民主风气浓厚。

1917年以后，作为一所处身上海的私立大学，在中国文学（简称国文）教学方面，复旦并不十分积极。1924年以前，复旦不单独设中国文学系，而专设国文部，使得国文课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大学语文这样的公共课。复旦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使学生普遍获得学习国文的机会，二是受上海大学普遍的实用风气影响，复旦当时更重视英语教学。因此，国文课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复旦的国文课，虽然从中学到大学每个班级每星期都规定有一两小时，但是十有八九都安排在下午。我当时虽然爱好国文，但因没有午休，上课时没精打采。”²⁾

国文部课程设置的滞后，也是影响国文教学效果的因素之一。国文部在的课程设置上，没有按照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学章程那样，把文学与哲学、史学、地理学分开，而是依然使文、史、哲三者相兼，特别还加以地理，“此科注重自然地理，俾学者知国内之广大富庶，激发其爱国务实之思想，而四方志特略论焉——限于时也。”1914、1915年国文部的详细科目为：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作文、古文、经、史、子等各门科目。³⁾如此课程设置，显示出复旦在中文学科设置方面及文科教育体制演进上落后于时代潮流，从19世纪开始已在欧洲发端并于20世纪初影响到中国的人文学科分科理念尚未确立，传统国学，尤其是明清书院教育重理学，其强调治学与修身并重，以培养经世致用的通才为目标的的教育观对复旦影响依然明显。新的文学教学与研究范式在复旦的确立，似乎还很遥远。这种与北京的大学相比明显的滞后，部分原因同样来自于上海大学学科设置方面的实用性目的，国文课只被看作提高学生基本素质的手段，而不是学生理应获得的专业素养，因此不必花太多的功夫进行改进与修饰。

到1920年复旦重新修订学校章程以后，情况也没有多少变化，国文部本级（即大学）课程依然包括国文、修身、地理、历史四门。在国文一门里，又包括：战国策、史记菁华、庄子、列子、作文等科目，使用《中华书局国文教本》、《正续古文辞类纂》等作为教材。在修身一门中，要求学生学习教育学、陆王学说。⁴⁾由此可见，直到1920年，复旦在国文部的课程设置上，还是延续着以往的思路，在总的目标上强调传统的儒家通才式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心性；在内容上，除了使用新教材外，与前面作文、古文、经、史、子等科目的安排大同小异。这种安排使得国文课只是其它如英文、经济、会计等专业课的点缀，因此独立与革新的意思不大，它的教育目的在于锻炼学生的国文基本技能，增强学生的人文素质，而不是建立一个现代意义的中文学科，更不以培养中国文学“专门人才”为教育目的。1920年，已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

2) 张廷灏：《私立复旦大学见闻回忆》，见：《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9（科教文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3) 以上材料见复旦公学章程1914、1915年。

4) 1920年复旦大学章程，复旦大学档案馆0358号档案。

茶的时节了，但如果我们把上文分析的复旦大学的课程设置，与北大的相对比，就会发现，复旦在北大的革新面前，明显落后了很多。北大当时已经初步设立了中国文学系，但在复旦却还是一片空白。在新的教育革新理念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北大中国文学系已经对传统国学教育进行了突破，例如对文学体裁的新的划分、文学史科的设置、以及对西方文学的关注，但这在复旦国文部的教学中却依然匮乏。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新文学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新文学课程当时也不在国文系课程设置里。

显然，1924年以前，陈旧的复旦国文教育领域里，不仅没有现代性质的中国文学学科的容身之地，更遑论刚刚诞生的新文学了。旧形式与新内容之间发生着矛盾，旧的国文教育方式也逐渐显示出对人才培养的不利。1924年底，复旦大学在刘大白的主持下改国文部为中国文学科⁵⁾，真正走出了传统窠臼，中国文学开始作为一个学科，向现代大学的学科设置靠拢。并且，在这次教学改革中，中国文学科还设立了“中国语体文学史”这样的课程，使得新文学课程最终进入了大学主流课程设置，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领先的。

二、复旦校园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以浅草社为例

从校园文学发展的线索来看，尽管新文学在这段时期内完全不在复旦校方国文教育的视线之内，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学科也尚未在复旦建立，但新文学却已经成为复旦民间校园文学中一只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大学讲堂内外，“官方”知识的陈腐与校园文学的趋新形成鲜明的反差。复旦自由民主的校园氛围，为学生活动的踊跃和众多学生社团的涌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肥沃的土壤，复旦大学学生的结社热情，也使得新文学运动以后，学生开始在校期间组织和参加与新文学有关的文学社团；复旦营造了宽松的氛围，学生思想的进步和开

5) 复旦大学中国文科科设立于1924年，但由于缺乏学生宿舍的原因，真正开始招收学生是在1925年秋季。

放，也为新文学进入“民间”校园留出了一定的空间。1922年，复旦大学学生陈翔鹤与外校学生林如稷、北大学生陈炜谟等发起组织浅草社，编辑了《浅草季刊》和《文学旬刊》；1924年后建立的复旦中文系主编过系刊《青海》，组织过文学社；1925年，复旦成立了复旦新剧团，1926年改名为复旦剧社，一直活动到今天。到了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抗战前夕，还成立了文摘社，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1924年以前，活跃于复旦校园中且对新文学影响巨大的新文学社团应数浅草社。固然不能完全说浅草社是复旦的学生文学社团，但浅草社与复旦学生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它的几个重要社员，如陈翔鹤、王怡庵、陈承荫、周乐山等，都是当时复旦的在校学生。浅草社创立于1922年，由在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就读的林如稷，联络他的复旦同学陈翔鹤、北京大学的陈炜谟等发起。为了使自己的创作有发表的园地，他们于1923年3月自费印刷出版了《浅草》季刊。不久经过与上海《民国日报》交涉，浅草社于同年7月开始又负责编辑作为该报副刊的《文学旬刊》，附于该报印行。因此，《浅草》季刊和《文学旬刊》都是浅草社的主要阵地。浅草社的成员大都是复旦、北大的同学。据已掌握的材料，当时就读复旦者，有陈翔鹤、胡絮若、王怡庵、陈承荫、周乐山诸人；而就读于北大者，则有冯至、陈炜谟、高世华、李开先、汤懋芳、游国恩等人。1923年林如稷赴法国读书，此年底，陈翔鹤因“嚶嚶求友”之故⁶⁾，放弃了复旦学位赴北京后，王怡庵和陈承荫还在先后负责《文学旬刊》在上海的编辑与发行，直到1924年二人都离开上海以后，《文学旬刊》的编辑工作才转到北京。因此，浅草社与复旦的关系不可谓不“亲密”。

学生文学社团的出现，是新文学传播趋势的指针。浅草社主要由在校学生组成，浅草社也可看作是校园文学社团，他们的作品，带有校园文学的色彩，清丽纯净，喜乐与哀伤的吟咏都带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

在一共四期的《浅草》季刊中，发表了复旦学生陈翔鹤、胡絮若、王怡

6) 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见：《陈翔鹤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36页。

庵、陈承荫等人的小说、诗歌、戏剧等创作。其中陈翔鹤的作品最多，成就也最高。此外，《浅草》上还发表了后来成为复旦教授的赵景深的诗歌创作。除陈翔鹤外，胡絮若、王怡庵、陈承荫在《浅草》上发表的多为诗歌，这些诗歌意境浅显，内容简单，反映了早期新诗创作期形式虽然解放、但稚气未脱、成就不高的特点。

如王怡庵的《独坐》（一）：

绿叶变了黄色，/红色的花儿落了满地；/只有鲜黄的菊花，/娥媚在秋
风里。⁷⁾

与同时代相比，尽管复旦以儒家传统理念为主的国文教育显得落后很多，新兴的新文学未登上复旦讲坛，但在以学生群体为主的校园文学层面，新文学却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有关新文学的实践非常活跃。课余生活的丰富与广阔远远超过了课堂教学对于知识的控制。复旦课堂上的国文教育与实际发生的校园文学之间发生了巨大的疏离。这种疏离体现了知识生产与人的心灵成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难以弥合，但这种疏离也实际上反映出了复旦文学教育目标与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而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学生对于新文学的推崇、实践与需求，恰恰为以实用为主、以市场为目的的复旦大学、乃至上海的现代大学引进新文学课程提供了可能性。1924年底复旦大学的教改也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三、陈翔鹤与其未入集的短篇小说《青春》

实际上，学生在校园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与国文教育目标相背离、甚至完全相反的倾向，更深层次反映出以监视、检查、考试等“齐常化”判断为主的现

7) 王怡庵：《独坐》，《浅草》，1925年第1卷第4期。

代教育理念和体制与个体生长、人性关怀之间的龃龉。

1923年，浅草社干将、复旦学生陈翔鹤在《复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青春》。陈翔鹤哀伤的《青春》，反映出了人的成长与现代大学教育理念中对于人的培养教育之间的协同与矛盾。

陈翔鹤没有出版过全集。在鲁迅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卷）》里，选了他的两篇短篇小说：《See!……》和《西风吹到了枕边——记梦并呈晦》，这两篇小说都发表于1927年。我翻阅了所有能寻到的陈翔鹤的作品集，都未见《青春》这篇小说的踪影。没有选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因为这篇作品质量不够高，还不能入编者的“法眼”，二可能是因为这篇小说发在校园刊物上，编者都没有留心到。事实上，《青春》并不稚嫩，值得一读。同时，我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辑、199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陈翔鹤代表作》后面附了一个《陈翔鹤主要著作书目》，这个书目里，主要围绕陈翔鹤在浅草社的两份主要刊物《浅草》和《文学旬刊》上发表的作品来编写他的著作书目，因此我比较倾向第二个原因，即因为发表在校刊上的缘故，这篇小说被很多人遗忘了。

陈翔鹤出生于1901年，四川重庆人。1920年考入复旦，写《青春》时也正值22岁绚烂的青春年华。《青春》的情节很简单，以现在的眼光看，它更像散文，但当时《复旦季刊》的编辑，却是把它当小说推出的。小说写了三个触动主人公心弦的场景。第一个场景是：主人公放假回家，叔父请他在假期里帮助几个幼小的表弟妹学习功课，而主人公看到院子里正在玩耍的弟妹们，尤其是最小的弟弟十分天真又有点“憨”的眼神时，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他感叹：“一切的小孩——为我‘青春的幻像之花。’现在我不幸又作了这桩恶事了，我破坏了我的‘像之花’的乐梦，更悲伤我‘青春’之不可再来，就梦想也不可长住。”第二个情景是：学校要放假之前，同学们开同乐会，大家吃饱喝足以后，就开始胡乱说话动作、张扬青春的风采，但主人公却在这热闹的场面里又感受到了哀伤：“这都是他们众人自己所现在存留着，进行着，享受着的‘青春的表现’。但是我呢？……什么是我所有的，什么是我所可纪念的？……”第三个场景是：主人公回忆起他的一个朋友，经常把从心坎上发出来的“哀柔刺人”的“算了罢”挂在嘴边。有一次，他与主

人公道别，也用“算了罢”作为别语，主人公禁不住为这位朋友的少年老成、青春的早逝而感叹：“在我所有朋友当中，最薄命，未满二十即寂然凋谢的朋友，只有他一人，而从他的‘算了罢！’一语，已可以体察出他凋零残毁了的‘青春’的最后悲叹——也是一切青年们未即使，及被强迫深入秋景的无穷悲叹。”

“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人的意义的发掘和提倡个性的解放。《青春》中哀叹的，是年华易逝的悲哀；它所追寻的，是个人的人生意义，是五四运动以来，在传统与西方的对立中发现的个人的价值的张扬。对《青春》及陈翔鹤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是人从孩童阶段开始，就自然成长，真正享受“青春”的快乐，不受环境与命运的胁迫，能舒展青春的激情。这种“个性主义”的价值观，主要来自于他们在校期间所接受的西方文化。他们坦言：“人的最宝贵的”“是自己”⁸⁾；“其实我自我，人自人，到不得已时仅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何苦白白为人背十字架。”⁹⁾正如陈翔鹤在一封信里所宣示的：

惠修，若是你要寻求上帝，“自己”就是你上帝；若是你要寻求人间“至宝”，“自己”就是你至宝！我们纵不能为兽中虎豹般的人中英雄，有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的气概，至少亦应凡事都以“自己”为本位（顺我者迎之，逆我者拒之）¹⁰⁾。

虽然个性主义出发的人生追求是纯真美好的，但现实却把这一切击得粉碎。于是作者的情感便由《青春》（1923）的哀伤，过渡到后来《See！……》（1927）中对于人生百态、人情可笑处的冷嘲热讽。这种饱含热泪的哀恸和超然室外、对于世故的尽情嘲笑，来自青年人对于自由人生的诉求。他们追求心地的纯净与美好，这种纯净与美好使之拒绝一切沾着污点的成年人的世俗。

由于青年人自我意识觉醒的时候，恰逢他接受大学教育之时，因此，人们理想中的大学理念里，还包含一层意思，即大学应该提供给青年人“一个可以获

8) 冯至：《1931年1月20日致杨晦》，见《冯至全集》（第1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

9) 陈炜谟：《暮霭——给友人君培》，《文艺周刊》，1924第41期。

10) 陈翔鹤：《1924年10月4日致杨晦》，《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得整个生命的最大可能的快速成长的情境。”¹¹⁾个体的成长需求与现代大学理念中蕴涵的对人成长的关切是协调的。然而，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现代大学教育功能的实现，更多的通过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体现的。这就使得大学在对待学生的时候，采取的是课堂教学的整齐划一的形式，通过教室空间、时间的控制、作业、检查、考试等“齐常化”判断等策略操控了课堂教学，组织起了知识生产的过程，而并不注重每个学生个体之间个性、偏好等细微的差别；在决定什么样的知识应教授给学生时，则采取工具理性的态度，选择“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教育环节中，学校给予的更多的是知识，而不是对于个体的关怀与扶持。于是，学生的个人成长与大学理念之间，又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因此，个体的头脑与头脑、心灵与心灵的相遇，很难在课堂上完成，而是在校园内师生间、同学间的交流里完成的。《青春》带有“校园文学”的特征，但比一般的校园文学走得更远，它不仅仅是情绪的宣泄，更是体现了人生价值的哲思。

《青春》的哀伤告诉我们，对于个体的迷惘与痛苦，内心的价值判断、心理感受等等与个体相关的东西，是现代教育体制下，是无法从知识层面得到抚慰与解答的。尽管学校教育总是野心勃勃，想要担负起教育的全部内容，但现代教育却因其内在缺陷，实际上对此常常无能为力。

四、结论

因此，从传统思维来说，大学校园里的文学书写支持了新文学的发展，补充了新文学创作的力量，是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多有提及的一个领域。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新文学在学府内的发展也受限于当时的文学生态环境，它虽无法摆脱大学教育环境对其进行的“场域”限定，但却从青年人特有的成长需要中郁郁地生发出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知识传播为主导、“齐常化”为手段的现代大学教育过程中轻视学生主体性的缺陷。因为知识在固然现代课堂上变得丰富

11) Elton Trueblood. *The Idea of a College*. N.Y.: Harper & Brothers, 1959: 13.

起来，但精神和灵魂还有欠缺。因此，五四新文学甚至在青年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情感抚慰和精神升华的作用，为青年人提供着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使他们在“知识控制”与“权力规训”的挤压中获得思想自由的源泉和动力。我们可以宽泛地说，如果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完满的人生，那么当时的五四新文学则是一个关于何谓“完满的人生”的巨大寓言。这个人生寓言在青年个体身上完成了对现代教育机体欠然的救赎，它使得青年们面向深渊呼告时并不孤单，因为身边还有一双文学之手扶住他们。新文学与教育的别样关系，在学子们的青春呓语中变得清晰起来，而这或许对我们今天的文学教育也有启发。

参考书目

- 《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9（科教文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陈翔鹤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
- 《陈翔鹤选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 《冯至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复旦大学小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1905-1949第一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 宗有恒、夏林根：《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 Elton Trueblood. *The Idea of a College*. N.Y.: Harper & Brothers, 1959

〈Abstract〉

Literature education at Fudan University and Qiancao Society(1917-1924) :
A case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education

Yang Rongrong

Before the New Literature related curriculum was set up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Fudan University in 1924, it had flourished in the campus cultural societies for 7 years since it was born in 1917.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inese literature education, a students' literature society—Qiancao Society and an individual New Literature writer—Chen Xianghe at Fudan University during those 7 year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 :: Fudan University; Chinese literature education; New literature; Qiancao society;
Chen Xianghe

투 고 일 : 2010. 5. 10. / 심 사 일 : 2010. 5. 20. ~ 2010.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6. 15.